

# 泰国华人政治生活的变迁

许梅\*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泰国华人; 政治生活; 变迁

[摘要] 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 泰国华人同化较早且与当地融合得较为彻底, 他们很早就参与了当地的政治生活。泰国华人政治生活也相对简单, 远没有东南亚其他国家那么复杂, 其参政历程虽经历了波折, 但总体而言较为顺利。

[中图分类号] D7336.6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2)02-0016-05

据泰国史料记载, 中泰两国间的交往开始于公元1277年素可泰王朝时期, 在素可泰王朝第三代国王蓝摩甘亨王在位时(1287~1317年), 华人开始移居泰国, 自此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 泰国历代王朝大都对华人持欢迎态度, 同时也能善待华人, 不少华人被吸引前来经商、做工、务农, 并在泰国长期生活居住。华人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 也为泰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时至今日, 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不仅成为泰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 而且在政治上也多有所建树。从泰国华人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 泰国华人的参政活动主要经历了战前和战后两个发展阶段。

## 一、二战前泰国华人的参政活动

二战前泰国华人的参政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与泰人一起同心协力, 共同抵御外敌入侵; 2. 少数华人精英分子受到泰王的重用而直接参与泰国的政治活动; 3. 华人对同祖籍国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活动大都较为关心并积极参与。

历史上华人最早参与泰国政治活动的时间恐怕要追溯到阿瑜陀耶王朝(1349~1767年)时期, 华人一般称之为大城王朝时期。据史书记载, 在1760年阿瑜陀耶王朝最后一位国王阿迦达在位期间, 缅甸军队入侵暹罗, 在反抗缅甸侵略者的斗争中, 华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英勇抗战, 保卫大城。当时, 约有6000名华人分散在各个要塞, 他们与暹罗人民一起并肩作战抵抗缅军, 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阿瑜陀耶王朝沦亡后, 暹罗人民开

始了驱缅复国的斗争, 在此期间, 祖籍广东澄海的华裔郑信脱颖而出, 他招募了一支由华人和泰人共同组成的队伍开始了光复历程, 期间不仅得到了众多华商的慷慨资助和物资支援, 也得到了不少华人在人力和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郑信率部下成功地将缅甸占领军从暹罗驱逐出去, 并在人民的拥戴下建立了吞武里王朝, 郑信则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皇帝”。

泰国历代国王对华人中出类拔萃者大都采取重用的态度, 或对他们封以爵位, 或委任他们做地方官吏, 使他们效忠泰王, 全身心地为泰国服务。这是一种温和的同化政策, 那些身居泰国上层社会的华人精英们很早就被同化了。早在大城王朝时期已有华人在泰定居并出任官职, 他们也像泰人一样获封官衔爵位。当时, 为方便泰中贸易的开展, 泰国几种官衔是指定必须由华人担任的, 如外事官员(主管涉外事务, 包括从事对外贸易事务)、航海官员(主管远洋航海事务)、大公(领航员)、船主(船务总管)等, 泰王则根据各人职位的重要性而赐予相应的爵位。<sup>[1]</sup>1840年有华人移民被授予官职的记载, 17世纪也有不少华人受泰王委任担任高官要职。郑信建立吞武里王朝后对华人更是加倍重用, 他首先对有功的华人将领和有特殊贡献的华商华人封爵授官, 委以重任, 并起用了不少华人佐政, 其中最为著名的, 在泰国华侨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政治人物当属华人吴阳。吴阳曾任税吏一职, 由于成绩突出而被郑王封为子爵, 后又被封为“宋卡府尹”, 华人都称之为“宋卡王”或“吴王”, 至其去世后又被迫封为公爵(昭帕雅)。之后吴阳之子

\* [收稿日期] 2002-03-04

[作者简介] 许梅,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讲师。

文辉被封为“宋卡二世”，其孙志从“因击败入侵缅甸立功”被册封为“宋卡三世”，直至第八代。<sup>[2]</sup>也就是说1896年以前的一百多年中，吴氏一门八代都因有功于泰王朝而被封为宋卡府尹，这不仅在华人中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泰国政坛也是屈指可数的。到曼谷王朝（亦称却里克王朝）时期，泰国南部重镇如拉廊、宋卡、普吉、北大年、董里等地的府尹，大都由华人望族担任。许泗漳和其子许心美就是这一时期活跃在泰国政坛上的两位杰出华人。许泗漳曾因开发泰南重镇拉廊有功被泰王册封为子爵，后因其对王室忠心耿耿，同时为促进拉廊地区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泰王将其视为有功之臣，遂被晋封为侯爵。许泗漳之子许心美曾被暹庭封为子爵，后升任吞武里城的府尹一职，被晋封为侯爵。之后又出任董里府府尹，为董里府的建设与发展尤其是橡胶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01年许心美升任普吉省（若干府并为省）省长，成为第一位出任省长的华人，至今其铜像仍矗立在董里府中。<sup>[3]</sup>可以说，在泰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少华人在朝为官，受封爵禄，职居高位者也不乏其人。尽管在泰国华人中受泰王重用而直接参政者尚属少数，但他们对泰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是难以估量的，与此同时，他们对泰中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为泰国华人与当地社会更进一步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20世纪以后，泰国华人的政治活动日趋活跃，这主要受到中国国内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影响。中国的北伐战争、辛亥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次革命斗争，都直接反映到泰华社会。华人对政治的真正关注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日益关心祖国的发展，而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配合、积极参与和响应。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泰国华人大都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号召，他们不仅在孙中山领导下先后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总支部、国民党海外支部和中华会馆等团体，而且还创办了华文报纸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作宣传。他们积极捐款捐物，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支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泰国华人在1910年成立的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下组织了各种救国慰问团，这些华侨爱国进步团体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募捐救国等抗日宣传活动，并组织

帮助华人青年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泰国国内，华人不仅以怠工和罢工的方式破坏日本的军需生产和后勤供给，而且还与海外泰侨建立的泰国抗日民族组织——“自由泰”运动联合起来，同时积极参与当地的抗日义勇队和反日大同盟的反日斗争，从而与泰国人民一起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共同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南进，直至日本投降，中国抗战结束后才告一段落。

## 二、二战后泰国华人政治活动的发展变化

二战结束后，泰国华人政治活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战后初期，大多数华人的政治向心力主要还是偏向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战胜国，华人在意识中有优越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由于1941年奎披汶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日泰攻守同盟》，并于次年在日本的压力下向英美宣战，尽管美国后来宣布泰国不是敌对国家，但也无法改变泰国是名义上的战败国这个事实，这也导致了泰国战后国际地位的迅速下滑。随着奎披汶政府的倒台，泰国国内的排华势力也受到沉重打击，战后由前“自由泰”主要成员组成的泰国新政府，对泰华社会的各项活动则采取了放任政策。因此，战后初期泰华社会倾向中国的各项政治活动由于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而蓬勃开展起来，具体表现在泰国各种注册立案的华人进步团体，纷纷开展了捐款、运粮、输送人才回国等活动支援祖国的爱国运动。<sup>[4]</sup>50年代初期，不少华人特别是在中国出生的新老移民，在政治上仍只认同中国，要让他们改变国籍和政治身份似乎还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

1948年奎披汶重新上台执政，他追随美国推行反共排华政策，并严格限制华人的政治活动。1952年，泰国政府取缔了所有注册立案的华人爱国进步团体、学校和报社，致使华人的爱国运动转入低潮，最后逐渐消失。华人的公民权也曾一度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被剥夺。不少华裔为官者不敢承认自己的华裔身份，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华人与泰人不具备同等的政治权利。奎披汶政府的排华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甚至切断了华人与祖国的政治联系，同时也阻碍了华人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经历了排华运动后华人认识到，要在泰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不仅要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还必

须在政治上与泰国保持认同,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另外,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获得当权者的支持和帮助,才能使自身所建立的政治经济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在奎披汶政府对华人实行严厉压制政策的时期,华人社团特别是中华总商会则充当了华人政治上的代言人,他们与政府当局特别是军警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以获得有效的政治保护。到后来,一些华商也开始通过与泰国政治领导人建立“互利联盟”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这在华人后来的参政活动中成为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对于那些在中国出生的新老移民来说,他们的传统认同观受到冲击,不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改隶泰国国籍。入籍可以说是压力下的产物,但它对日后华人政治的真正转变起了促进作用。

1955年中国取消了双重国籍政策,1956年泰国政府修改了《国籍法》,放宽了华侨的入籍条件,并取消了对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在政治、经济上的歧视政策,致使华人的入籍人数不断增加。50年代后期,泰国95%的华侨都加入了当地国籍,华人政治认同也从祖籍国逐渐转向了泰国。拥有泰国正式公民身份的华人,其参政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中有不少人都直接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可以说,战后华人传统的“叶落归根”的思想受泰国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而日渐减弱,“落地生根”已为大多数华人所接受。可见,“由于泰国政府较早解决了华人的入籍和公民权问题,因此,泰国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也早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并且较为顺利和彻底。”<sup>[5]</sup>不少华人都认为,“既住泰国,只要有好的环境,能够安居乐业,生居于斯,长根发叶,则祸福同尝,荣辱共享。”<sup>[6]</sup>随着华人逐渐融入泰国主流社会,华人的目光已开始从关心祖籍国的政治命运转移到更多地关注泰国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特别是1975年中泰建交后,泰国政府又进一步放宽了华人入籍条件。80年代初,政府取消了对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的参政限制,规定只要是合法的泰籍公民,包括改隶泰国籍的华侨,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而为华人更进一步的政治融合创造了条件。据统计,1946~1948年华侨入泰籍者只有145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华侨无人改籍;50年代入籍者年均不足100人;60年代年均300多人;70年代年均增至400多人;80年代年均增至1000余

人,申请者以40~50岁的华侨最多。<sup>[7]</sup>据估计,目前泰国华侨人数大约只剩下25万人左右。入籍人数的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华人与当地政治融合的步伐。如今,华人选民已开始成为各大政党在大选时主要争取的对象,华人的参政范围有逐渐扩大且日渐深入的趋势。直接和公开参政已成为当今泰华社会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从战后泰国历届政府中不断涌现出的华裔身影中略见一斑,他们中有能力担任要职者的人数也相当可观。我们不妨看看以下数字:1965~1966年在内阁19位成员中,华裔占了12位;1983年大选后组成的政府中,4位副总理中有2位是华裔,部长和部长助理中有7位是华裔;1986年的大选中,有86位华裔当选为众议员,成为由147名议员组成的众议中“最大的职业团体”;1987年3月由泰王普密蓬任命的由94人组成的参议院中,有20人是华裔;1991年泰国357位议员中华裔人数有近百人之多,内阁44名成员中华裔就占了一半以上。在各大政党中也出现了不少华裔领袖,如前正义党主席钟隆·诗曼(卢锦河),泰国党主席挽限·信拉巴阿差(马德祥),民主党主席乃川·立派(吕基文),祖国党主席披集·叻达军(陈年平),人民党顾问主席越他挪(马氏后裔)等等。据有的学者的不完全统计,自1975年以来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副总理职务的华裔就多达20多位,其中担任过总理一职的有:乃比里·帕依荣(陈璋茂)、乃朴·沙拉信(黄姓后裔)、乃他宁·皆威昌、他旺·纳哇沙越(郑连淡)、察差·春哈旺(陈氏后裔)、乃川·立派(吕基文)、挽限·信拉巴阿差(马德祥)以及现任总理他信·秦那越(邱氏后裔)等等。<sup>[8]</sup>担任过部长职务的华裔更是多不胜数。其他杰出的华裔政治人物,例如,在促进泰中关系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的泰国驻中国南京政府首任大使乃沙愿·杜拉叻(张良心),以及素有泰国基辛格之称的前国会主席乃巴实·干乍那越(许敦茂)。自50年代步入政坛取得成功后,许敦茂先后担任了人民代表、上议院议员、副部长和商业部长,1975年出任国会主席。许敦茂先生为泰中建交和后来泰中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据估计,从1986年至今,泰国历届内阁中的华裔成员约占一半左右。可见,泰国华人大部分已在政治上完全融入了当地主流社会,并成为活跃在当今泰国政坛上的一支主力军。

### 三、泰国华人的参政模式与特点

从泰国华人政治生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来看,泰华社会并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固定统一的参政模式,因为华人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形成、华人参政方式和参政行为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泰国不同历史时期主客观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华人的政治活动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且,就华人自身而言,每个华人群体和每一代华人的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他们对祖国和居住国都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此外,年龄的代沟、出生地的不同(中国或是当地)、方言的隔阂、文化程度的差别、社会地位的高低、经济实力的强弱等,都可能是导致华人群体内部产生政治分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华人参政意识和政治态度所产生的影响最终也会在华人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出来。著名学者王庚武教授以政治态度为依据,将东南亚华人划分成甲乙丙三个不同的政治群体。他认为甲集团是经常“与中国政治保持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群人,他们“总是关注着自己与中国的共同命运”;乙集团是“由精明而讲求实际的多数华人组成,他们关心的是贸易和社会团体的低姿态和间接政治,人们的目标最温和,常给人以不问政治的印象”,他们“很少就政治理想和长远的政治目标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一般满足于通过既定的政治集团进行工作,并在这一集团内部衡量影响和权力问题”;丙集团是一个小而不稳的混合团体,其成员来自多个阶层,在政治上他们依附于当地的统治阶级,有些还与土著权贵阶层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sup>[9]</sup>按照这种划分,在泰国华人中,甲集团的成员在政治上是强烈认同中国的,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成为祖国革命运动在海外的延续,且通常以爱国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乙集团的华人关注经济胜过对政治的关心,他们常常通过互利的“官商联盟”的方式寻求政治保护,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是一种间接的、被动的参与。丙集团华人较易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政治生活,他们的参政方式大多以直接参政为主。看来,政治态度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华人对参政方式的不同选择。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华人集团的参政活动也各有其特点。就泰国的情况来看,20世纪之前移民到泰国的为数不多的华人中,属于丙集团的人数不少。因为,早期移民到泰国的华人主要

有两类,一类是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他们中不少人受到泰王的重用而直接参与政治,最后自然而然地被泰国的上层社会所同化;另一类是身无分文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计的平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早就与当地通婚,也渐被同化了。此外,不太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乙集团的华人也不少。进入20世纪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情况发生了转变,受中国国内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影响,倾向中国政治的甲集团的人数急剧上升,他们中有不少人同时也属于乙集团的成员,这是以他们对当地的政治态度为依据的。二战后,特别是自1955年开始,甲集团的人数日渐减少,其成员流向乙集团和丙集团。1975年中泰建交后,丙集团的人数有日渐上升的趋势。随着年青一代华裔的不断成长,丙集团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目前,泰国华人中的大多数应属于丙集团,因为他们大都早已融入主流社会,成为与泰人享有同等参政权利的合法泰籍公民,直接参政成为他们的主要参政方式。

从泰国华人参政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中人们可以看到,泰国华人经历了一个不参与当地政治到参与与祖国相关的政治活动,再到最后积极踊跃地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转变历程。二战以前,泰国华人大都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一方面是由于政治与百姓无关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因为自素可泰王朝至拉玛五世时期,泰王一直给予华人特殊地位,在国王的庇护下华人可以自由经商而不受限制。20世纪以前,不少华人已完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华人并未被当作外侨来看待,因为华人与泰人拥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华人比泰人享有更多的经济实惠。因此,对华人而言,是否参与政治活动并不影响华人自身的利益。当然,华人传统的政治认同观也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华人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关注,他们对与中国有关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在20世纪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大多数华人对当地的政治活动并不热衷,但仍然有不少华人因受泰王的重用而直接参与了泰国的政治活动,笔者认为,这部分华人对当地政治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自觉的政治行为。因为,华人来到泰国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其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他们并没有在异地他乡做长久居留的打算,对于那些小有资本的华商来说,他们也只想多赚一些钱而已,最终他们还要回归故乡,对政治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况

且，华人的参政意识一向薄弱。然而，泰王为感念这些对泰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华人，为他们封爵授官，并给予特殊待遇，希望他们留下来为泰国服务。或许是为了报答泰王的信任和知遇之恩，或许是因为留恋泰国纯朴的民风和风土人情，许多泰华精英分子最终走上了直接参政的道路，并成为泰国政治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才。可以说，早期泰国华人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融入到当地政治生活中的。

20世纪初期是泰国华人民主政治意识的萌芽时期，也是华人在政治上较为活跃的时期。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祖国革命运动的激发，因此，这一时期，华人的参政活动主要表现为爱国运动，而不是对当地政治的积极参与。由于华人在政治上是认同中国的，他们对当地政治的态度仍是被动的和漠不关心的。当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出现麻烦时，他们则会采用传统的实用主义做法，由华社领袖出面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这在后来銮披汶执政时期表现得较为突出。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华人大都对具有强烈的政治向心力。

从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銮披汶上台执政后发起了“唯国主义运动”（也称唯泰主义），对

华人采取了压制和排斥政策，华人的政治活动陷入低潮。富裕的华裔则通过与军警等官方部门建立联系的方式间接参与政治，以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官商联盟是这一时期华人寻求政治保护的主要方式。

二战以后，主要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泰国政府一改过去对华人的强硬态度，转而继续采取温和的同化政策，主要表现在入籍政策的日渐放宽，这使得大批华人选择加入泰国籍。在泰国本地出生的华人后代则依据出生地原则，自动成为拥有泰国国籍的合法公民。泰国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为他们直接公开地参与当地政治提供了良好契机。由于泰国华人融入当地社会较为彻底，因此他们没有自己单独的华裔政党，也不需要组织这么一个政党。他们与泰人一样依照各自政见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政党参与政治活动，这一点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参政方式明显不同。

如今，华裔作为泰人中的一分子，其参政议政已是非常自然和普遍的事情。从根本而言，华人或华裔参与泰人参政已无实质性的差别。

#### [注 释]

[1] 杨行、李灵：《泰中建交开路先锋泰国基辛格——许敦茂》，第89页。

[2] [3] 参见洪林：《泰国政坛风云人物数华裔》，载《泰中学刊》2000年10月。

[4] 沈顺：《浅析泰国华侨华人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载陈碧生编《华侨华人问题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页。

[5] 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

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6] 薛君度、曹云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123~124页。

[7] 江白潮：《泰国华侨华人现状》，载《华侨与华人》1989年第1期。

[8] 同 [2]

[9] 参见王庚武著、姚楠编《东南亚与华人——王庚武教授论文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86年，第159~160页。

[责任编辑：叶 晟]